

朝鮮學論文集

第一輯

北京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朝鮮學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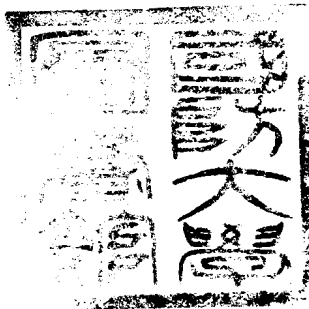
6066/19



朝鲜学论文集

第一辑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朝鲜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大字学术财团支援刊出

朝鲜学论文集

第一辑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朝鲜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230千字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301-01793-6/C·52

定价:5.35元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朝鲜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杨通方
副主编 徐永燮 沈仪琳
高宗文 杨永骝(常务)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尹辛淑 田桂文 杨通方
杨永骝 沈仪琳 何镇华
周四川 赵 习 贺剑城
高宗文 徐永燮 葛振家
秘 书 刘 渤

序

季 羨 林

对于朝鲜学，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为什么杨通方教授等一向我提出写序的要求，我立即满口答应了呢？

我先讲一件事情。

今年6月，应南朝鲜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焯博士的邀请，我同李滔和杨通方两位教授赴汉城作学术访问。南朝鲜社会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有十几位著名的大学校长和教授参加。我作一个报告，讲的是我最近几年来常讲的一个题目：《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是有区别的，区别的基础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的思维方式是综合，而西方的则是分析。从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来看，人类也仅仅有这两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东西方的文化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眼前是西方文化主宰着世界，但这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不管眼前多么煊赫，多么不可一世，也决不能“万岁”。西方文化现在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可能下一个世纪就是河西让位于河东的转折点，是以综合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化逐渐取代以分析思维方式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转折点。我所谓的“取代”，不是消灭，而是批判、继承、改造、转化，把西方文化的精华部分接受下来，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简而言之，我发言的内容就是这样。我的话音刚落，一位南朝鲜教授立刻简捷了当地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说老实话，我实在是大吃一惊。然而我保持住冷静：自己的发言大概还不够清

楚,也许这位学者所理解的文化就是物质方面的东西:飞机、火车、电灯、电话,如此等等。

我沉住气,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说:“韩国有东方文化,而且是具体生动的东方文化。”我举出了一个小例子。头一天我参观高丽大学的时候,这所大学的前校长金俊烨博士亲自陪着我们。他离任已久,并不当权,然而我们在校园里、大楼中遇到的男女青年学生,一看到金先生,都退避两旁,敬谨鞠躬。我当时实在是非常受感动。这一方面表示了学生们对金先生的恭敬;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毫无功利目的尊师重道的精神,不是东方文化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当然,东方文化决不限于这一点,它只是东方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一点流露。然而这一点流露难道不值得我们大大地重视吗?

我解释完了以后,那一位教授没有再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也许是同意我的看法了。

这一件小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这确实是一件小事情。然而它却引起了我的沉思。我一方面把它同东方文化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同朝鲜学联系起来。我们为什么研究朝鲜学呢?我的答复很简单:朝鲜学是东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化是东方各国,不管是国大國小,共同创造的。中国、印度、日本等国都有一份,朝鲜当然更不例外。对于东方文化,朝鲜人民在历史上做出了许多贡献,在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都有令人难忘的业绩。就拿佛教文化来说吧。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又经过朝鲜传入日本。后来也有直接从中国传过去的。佛教对这三个国家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用不着再作什么论证。然而在中国的《高僧传》中,西行到印度去求法的高僧中,颇有一些朝鲜古代的僧人,《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这部书已经译成了英德等外国文字,研究印度佛教史、中亚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等的学者,都视此书如瑰宝。此外,还有一些万里投荒的朝鲜古代僧人,把中印文化带回中国,带回他们的祖国,当

然也把中国等国的文化带出国外。朝鲜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当然决不限于佛教,我举佛教,不过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现在南朝鲜的朋友们颇为强调,南朝鲜的经济腾飞有赖于中国的儒学。事实上,他们尊孔、崇儒,恐怕要远远超过我们。可惜我于此道了解甚少,不敢赞一辞。我只是从整个东方文化关系来谈中朝文化关系的。我在上面提出的意见也许能得到南朝鲜同行们的同意吧。

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点。人类总是要进步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将来我们中国人同外国朋友合作的机会是很多很多的,我们要共同探讨的问题不可胜数。不仅在经济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文化,也是如此。在外国朋友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无疑会是同我们有密切的文化关系的朝鲜人民。在这方面,我们中朝两国的人民恐怕会是“心同此理”吧。

我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下,才敢于以一个朝鲜学门外汉的身份给研究朝鲜学的专著写一篇序。我大言不惭,放言高论,我不但不感到这是越俎代庖,而且感到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不知中朝双方的专家学者以为何如?

1991. 12. 3

目 录

序	季羨林(1)
方言研究的几点经验 ——介绍《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	喻世长(1)
前秦至后唐时期中国与新罗的双边关系	杨通方(10)
朝鲜汉文古籍《漂海录》初探	葛振家(48)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朝鲜的反日义兵斗争	杨永骥(73)
19世纪80年代中朝外交和贸易体制的演变	高伟浓(87)
儒教文化与朝鲜	沈仪琳(112)
朝鲜的习俗和礼仪	周必忠(132)
朝鲜古典小说《九云梦》和《谢氏南征记》	周有光(147)
试论朝鲜歌辞产生的原因	关华兵(163)
朝鲜近代的爱国诗人金泽荣	朴忠祿(192)
金笠和他的诗歌	何镇华(203)
中国朝鲜族语言的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徐永燮(211)
汉字在朝鲜半岛	周四川(224)
中国的朝鲜族语言	赵 习(229)
朝鲜古代使用汉文的情况及其影响	刘毓纘(236)
16世纪朝鲜的爱国将领李舜臣	伍 浩(250)

朝鲜近代的反日爱国志士安重根..... 晋 华(256)

30年代朝鲜报刊上一篇关于宋庆龄的报导

..... 周四川 杨永骝(264)

夏威夷大学朝鲜研究所简介..... 周四川 杨永骝(268)

Contents (271)

方言研究的几点经验

——介绍《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

喻 世 长

《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出版了(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这在我国语言学领域说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编写这部著作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从这次方言调查到编写成书,有什么工作经验值得谈一谈?限于篇幅和体例,不能在原书中对这样的问题详细叙述。

这次方言调查和报告的编写,我参加做了一些组织、计划和业务指导工作,对于方言调查研究提出过一般性的要求。整个工作大体上是按照这种要求进行的。调查报告的执笔人宣德五、赵习、金淳培同志要求我在原书中写一篇“结束语”,并且在出版以后写一篇评介性质的文章。

这部著作在朝鲜语方言研究中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已经在“结束语”中作了概括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这篇文章打算就方言研究的方法谈几点经验。这些经验是三十多年来我在汉语关中方言、布依语、蒙古语方言研究中逐渐积累的。这次又结合朝鲜语的实际情况作了一些具体的安排。下面所讨论的并非就《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逐章逐节地去评论,而是叙述方言研究应该达到的几点要求,也就是据我看来研究方言应该遵循的一些原则。为了叙述的方便,还得从方言的产生说起。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①。方言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早在人类社会共同体还处于部落时代，由于人口的繁衍和居住地域的扩展，从旧部落分裂出新部落时，地域方言就出现了^②。方言是语言分化的产物。因此，同时存在的方言的数目至少有两个，当我们谈论什么人操某某语言的某某方言时，就意味着同时还有什么人操同一语言的另外一个或几个方言。

当使用某一方言的社会集团以从事渔猎或畜牧生产为主时，社会集团住地经常流动，方言的地域稳定性是不强的。当一个社会集团以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时，这个社会集团使用的方言就有了很强的地域稳定性。长期的封建制农业国是方言得以保存的良好条件。工业走向机械化，大量农村人口从四面八方走入城市，加上水陆交通工具的不断进步，有力地冲击了古老方言分布的格局。但是，上千年或数千年形成的方言特点，仍然根深柢固地保存着。

语言分化为方言是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由于部落之间产品交换的频繁和部落联盟的形成，由于社会集团的迁徙和彼此之间发生战争等等原因，促使操不同方言的人民互相接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方言之间的互相吸收和渗透，和原来方言既相似又相异的新方言就可能出现。此外，原操某种语言的人在某种历史原因的促使下，自愿地或被迫地放弃原来的语言甲，改说另一种语言乙，却把原来所说语言甲的某些成分或特点带进了所改操的语言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一定的地域之中，语言乙的一种新的方言就可能在这个地域出现^③。

当我们观察同一种语言的两个或几个方言时，得到的印象必然是彼此之间在语言面貌和语言特点上，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

异的一面。如果完全相同就不存在方言了，如果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相异，就各自是不同的语言了。

使读者读了自己的著作，既看到同，又看到异，这是方言研究的第一个要求。

二

标准语和方言是一对互相对立的名称。假定我们在某个场合听到张三和李四在谈话。张三讲的是某某语言的标准语，而李四讲的是某某语言的某一方言，把他们的谈话录下音来，仔细分析，就可以对于标准语和方言的不同得到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概念。如果再深究一步，我们就要说，张三所讲的标准语，实际上原来也是某某语言的一种方言。和其他方言的不同只是在于这个方言已经取得了比其他方言更高的语言代表性，因此在语言使用中它对其他方言的影响，比其他方言对它的影响就要大得多。久而久之，其他方言的人当中会讲这个方言的人就越来越多。

标准语的这种优势是历史地形成的。为什么是这个方言而不是那个方言取得了标准语的地位，这并不是由方言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问题的答案往往要到语言外部去寻找。比方说，使用这个方言的人口比较多，这个方言居于或靠近政治文化的中心，经济发展又比较先进，那么，这个方言就具备了发展为标准语的条件。这也说明，当外部条件起了变化，也会引起标准语起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一种语言的书面语必然和标准语的口语相一致，必然反映标准语的发音和语法，必然以标准语的词汇为主导。其他方言的词儿可以出现在言语作品和词典里面，但使用者大体上知道那些词儿（连带着它们的发音）是标准语以外的。

在方言研究中把书面语的书写形式和自己所记录的各个方言

口语材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往往给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如果所研究的是尚未建立书面语的语言,也要从众多方言中选出一种方言,在每一次比较中都有它参加。这样,也可以使自己的工作有章可循,而不至于松散和零乱。

在比较研究中善于利用书面语(或某一有代表性的口语)的作用,这是方言研究的第二个要求。

三

科学方法的价值往往在于,运用这种方法能够把客观事物发展变化中重复出现的事实揭示出来,从而得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写语言学史的人都承认,自从在十九世纪建立了历史比较法,语言学就开始走入了科学时代。

历史比较法告诉我们,在一种原始语言系统之中表示某个事物意义的词,或某种语法意义的成分,当语言经历了分化过程以后,就会由原来一致的语音形式分别演变为几种不同的语音形式。在相同的条件之下,这种新的语音形式必然在众多的词和成分上重复出现。这就是语音对应规律和语音演变规律在起作用。当我们从一部分事实中概括出这种规律以后,就可以对处于同样条件下的另一部分事实作出可信的推测。

历史比较法开始只是在少数几个“语系”和“语族”之内进行探索,参加比较的语言也主要是若干有历史稳定性的书面语。由于材料是丰富的,工作是深入的,所以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历史比较法既然可以把有亲缘关系的各个语言统辖起来,因异求同,由同见异,推求音律,建立语系、语族的历史,那么,用这种方法把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统辖起来,再联系历史文献(如果有历史文献的话),建立语言的历史,就更不在话下了。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往鲜为人知的众多语言引起了语言学

家的注意,记录描写这些语言在语言学领域中所占的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为了如实地反映变化多端的语言事实,描写语言学的方法论也在不断完善和进步。怎样对于众多语言进行分类,怎样把几个彼此有一定程度相同性的话语看作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从而减少语言的种数,除了语言类型学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外,历史比较法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一点也是我国语言学家深刻体会到的。

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我国民族语言学家和汉语方言学家,面对以往很少调查研究的数十种兄弟民族语言(如果以方言来计算不下百种)和以往尚未全面调查的汉语方言,作了大量调查、记录、比较和描写的工作。在语言分类和方言划分的工作中都积累了许多新材料和新经验。通过这些工作,使历史比较法的科学价值得到了新的验证。

善于运用历史比较法,并为它注入新材料,使这种方法的科学性不断提高,这是方言研究的第三个要求。

四

作为历史比较法研究对象的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毗邻地分布在同一个地区的。可是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却是分布地域彼此连接的。方言和方言之间既有相同的特点又有相异的特点。如果我们在调查某一语言之前,提出了许多问题,安排了多个调查点,调查以后把每一个问题的所得结果记在一张张标明了调查点的地图上,然后观察各个调查点语言现象的异同。把每一条相异的现象都在方言分布图上用一条分界线隔开,许多分界线的走向是否都一致,有没有彼此完全重合或局部重合的情况呢?这就是“方言地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了。

方言地理学就研究方法来说是受到历史比较法的影响的。方言地理学的兴起比历史比较法要迟上几十年。历史比较法的奠基

人拉斯克(R. K. Rask)、格林(J. Grimm)、博普(F. Bopp)都出生在十八世纪末叶,方言地理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吉耶龙(J. Gilliéron)却出生在十九世纪中叶(1854—1926),比历史比较法的后继学者布鲁格曼(K. Brugmann)还小五岁。方言地理学的研究课题虽然不限于在地图上反映语音对应规律,但是如果把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方言得到的成果用地图表示出来,就可使语言面貌在地理上的分布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讨论方言的分界线,观察方言之间互相影响的痕迹就非常方便。

表示方言现象异同的分界线,称为“同语线”(isogloss)。不同语言现象的同语线可以各自有不同的走向。两条或多条同语线可以有全部重合或部分重合的情况,也可以全不重合。还有走向相似,彼此接近平行,但不重合,形成波浪形状的情况。重合的同语线构成“同语线束”。现在能够看到的各国语言学家绘制的方言地图集有把一个国家的全部版图作为地图范围的,有把国内某一局部地区作为地图范围的。一个语言现象绘制一张地图便于分析观察,若干语言现象包括在一张地图之内,便于综合观察。同语线束就出现在综合地图之中^④。

运用方言地理学的原理,绘制方言地图,探讨方言的划分,这是方言研究的第四个要求。

五

扩大语言研究的视野,把以往鲜为人知的语言和方言列入研究的对象,不仅验证了历史比较法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总结出了一套越来越细密的语言描写方法。

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在人脑中的存在是一种无比复杂、无比灵活的物质存在。说出话语和听到话语是一种心理生理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一种物质活动过程。对某一语言或方言进行描写,总的

说来就是揭示这种语言的物质系统的奥秘。语言描写日益走向细致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把语言研究区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对于语言学的不断进步是有利的^⑤。至于两种研究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⑥。从我们的工作经验看来，应该说两者既是不可偏废的，又是互相促进的。

一种语言的古代面貌和现代面貌的比较也属于历史语言学，但更多的事例是，历史靠多种语言或多种方言互相比较才能够建立起来。历时研究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多种材料，进行多点调查。共时研究则完全可以从一种方言或一种话语材料开始，并且以此为对象全面详细地阐述语言、方言或话语材料的系统性。贬低历史比较法价值的学者们所持的主要理由就是历史比较研究所涉及的材料并不能覆盖全面的语言系统，所揭示的规律其实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虚心的历史语言学家必然诚恳地接受这种批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位从事共时研究的学者对于所描写的单一语言对象以外的，和它有亲缘关系或类型相似的语言情况知道得很少，要把这种单一语言描写做得十分完美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主张断代描写和历史比较两种方法应该互相促进。两种工作的性质不同，不能混淆，促进并不等于掺杂，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方言研究中既可以受到语言描写的锻炼，又可以受到历史比较的锻炼。在单点调查和多点调查中不断提高揭示语言系统的能力，这是方言研究的第五个要求。

六

以上五点就是这次朝鲜语方言调查和编写调查报告时经常注意并且力求实现的目标。这五点要求提得是否合适，在这部著作中贯彻得好不好？那就要等待读者去加以评论了。如果读者感到这篇介绍的文章写得有些空虚，那么拿它和《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

对照去读,就不空虚了。如果问《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为什么写成那个样子,读了这篇介绍的文章也就清楚了。

注

① 地域方言以外,还有社会方言,也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可以说是语言的社会阶层的变体。

②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这个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7页。

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了语言转用的一种情况,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0页。

④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布依语调查报告》、《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等书中都有这种综合地图。

⑤ 费迪南·德·索绪尔首先提出这样的观点。

⑥ 参看乔利奥·C. 莱普斯基《结构语言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第100页介绍雅各布逊对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关系的论述。

编者按

《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宣德五、赵习、金淳培编著,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是研究朝鲜语方言的一部专著。

1982年,本书的编著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东北三省朝鲜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共同组织的朝鲜语普查工作队,对我国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朝鲜语进行了实地调查,记录了20个调查点的朝鲜语方言资料。1984年又在这些调查点进行了补充核实。《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便是根据这次调查记录的资料写成的。它是我国朝鲜语方言研究方面的一项初步的研究成果,也是在语言学上运用方言地理学方法的一次尝试。

这部著作共105万余字,分引论、语音、语法、词汇、朝鲜语方言的划分和结束语等部分。

语音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为“语音总论”,全面介绍了朝鲜语的